

经济充满生机 社会大体能够认同现有体制

西亚北非动荡在东南亚找不到落脚点



奥玛阿里清真寺作为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的象征,是东南亚最美丽的清真寺之一。

一位年轻人的世界观

去年记者参加过泰国外交部组织的一次活动,主办方请了几位在校的研究生来为外国记者当翻译。其中有位姑娘叫丽,活动中记者与她谈起那些走上街头的中东青年,问她为什么泰国青年对此不感兴趣。丽先是反问了一句“为什么要感兴趣呢?”似乎对记者提出这一问题很反感。但接下来,她还是告诉记者,泰国青年并不发愁找不到工作。“只要你努力,总会找到好一点报酬的工作的。”丽说。

泰国年轻人初次就业的工资其实并不高,大学刚毕业的能拿到大约13000—15000泰铢(约合2700—3000元人民币)。这笔钱在像曼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,也是紧巴巴的。但泰国经济这几年发展很快,外资不断进入,机会也不断增加。丽就常常去一些公关公司打工,挣的钱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。从与丽的交谈中可以感到,她对未来能有更好的工作、更高的收入是挺有信心的。

也许,丽这样的泰国年轻人对西亚北非的乱局未必了解得那么透彻,但她从就业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,的确也让我们看到了东南亚与西亚北非的差异究竟在哪里。

东南亚各国经济充满生机

将东南亚的前景与西亚北非所发生的事情相联系,有一个主要原因,同样也是一个主要的引起误判的因素,即东南亚是世界上穆斯林最多的地区。“那里的穆斯林很多,发生在阿拉伯国家的动荡,对那里是一种启发。”类似的评论常常见诸报端。不过,泰国大学生丽的话或许可以用来作这些评论的校正。

东南亚与西亚北非相比,直观上最大的不同,是这里充满了生机。每个人似乎都在忙碌着,游手好闲的人不多。人们在这个社会中有自己的位置,也有希望找到或许更好一些的位置,就像他们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链条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样。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等国一年来吸引外资的势头十分强劲,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。

记者在东南亚工作一年,走过几个国家,到处都可以感受到经济的活力。比如在越南,有两个景象吸引了记者的目光。一是河内的商铺极多,几乎所有沿街房屋都开成了饭馆、旅店、咖啡店和各种各样的小店,货品琳琅满目,商业气氛极浓,有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时全民经商的味道。

二是在去农村的路上,看到各处村镇都有许多越式小楼在建。这些窄窄的小楼,高的有六七层,矮的也有三四层,外表有的已经装饰一新,给人一种家家都在盖房的感觉。有越南朋友如此形容:“中国已经走进了社会主义大厦,而越南人现在正急着往大厦里面跑。”

两年前,记者曾有机会去突尼斯和埃及,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聚集在街头闲聊的年轻人。在中东的很多国家,青年失业率均在30%以上,有的甚至接近50%。那么多年轻人失去了就业的机会,同时也就失去了对生活和未来的希望,他们的选择很可能就是走上街头。

美国学者福山在分析去年西亚北非出现的动荡时这样写道:抗议运动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最穷苦的阶层,而是来自受教育的中产阶级,他们觉醒的政治意识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忍受“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”。

社会大体能够认同现有体制

如果一种体制能给人们,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和希望,能够大体满足人们的就业需求,那么这种体制所获得的认同度也会比较高,社会可能就是稳定的。在这样的社会中,即便出现政治上的诉求,也不至于引发大动荡。民主的关键,其实就在于人们虽持不同的意见,但都能认同国家的基本制度。

东南亚国家现有的体制不是完美无缺的,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体制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,甚至连被称为“历史终结”的资本主义体制也面临着改革与调整。东南亚的体制也常因腐败以及受利益集团左右、法制不严等问题屡受批评,但社会大体上还是能够认同现有的基本体制。至少,人们认为,一些问题应当在现有的体制中加以解决,即使是走上街头,也大多是为了推动对体制的改革,而不是要颠覆这一体制。这是东南亚与西亚北非的根本区别。

东南亚各国的体制大体上保持了相对比较稳定的运行。在马来西亚,反对党领袖安华虽然说过,“‘马来西亚之春’已经到来”。但他同样也说过,这应当在现有体制框架下,通过改革来完成,而不是彻底地革这个体制的命。

在泰国,去年大选期间虽有游行示威发生,但整个选举过程基本按规则运行,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。最近,反独裁民主联盟(反独联)支持者“红衫军”举行的游行示威,主要仍是针对体制完善的。他们支持为泰党政

府修改宪法,希望通过修订来制约军方。

即便是缅甸从去年春天以来开始的引人注目的变革,也是自上而下进行的,至少从目前来看,仍属于渐进型。尽管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对现政府的变革仍持谨慎乐观的态度,但她明确表示,反对进行一场阿拉伯式的“革命”。

去年新加坡大选时,反对党比以往赢得了更多席位,一些西方学者当时认为,新加坡的“威权政治体制”走到了头,“‘新加坡之春’即将出现”。这样的分析完全是套用西方的理念,背离了新加坡的实际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和记者谈到这一问题时说,新加坡反对党要求的,是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内进行改革。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以法制为基础的体制,这是稳定的保证,即使是反对党,也对这一体制是认同的,这和西亚北非国家完全不同。

发展是东盟国家首要目标

当然,制度本身是文化的产物。东南亚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地区,现在的社会制度与穆斯林文化是有一定联系的。相比较而言,东南亚的穆斯林比西亚北非的穆斯林世俗化程度要高,教派冲突要少。曼谷易兰仓大学教授伊姆提亚兹·约素夫认为,在更为普遍的层面,经济发展的压力,以及物质主义现代化和消费文化全球化的影响,使东南亚穆斯林开始与伊斯兰教严谨的传统教义越来越疏远。他认为,东南亚穆斯林世俗化程度很高,伊斯兰教更多的是一种“民族特征”,很少包含强制性。这使得东南亚的社会比西亚北非一些国

家更开放,在经济上也更多元。

观察东南亚国家的政局变化,还应当将其置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。目前,东盟与中日韩“10+3”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,发展是东盟国家的首要目标。东盟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与竞争,促进了变革,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政治影响。近年来,东盟国家间的政治联动性在不断增强,缅甸自去年春天以来发生的变革,就与此密切相关。

这并非意味着东南亚国家未来就是一帆风顺。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上升期,经济蛋糕看来会越做越大,但这也往往也意味着如何分蛋糕会出现麻烦。因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原有的分蛋糕体制并不完善,一些利益集团占有传统的优势,总会多分一些蛋糕,或者试图维护其多分蛋糕的权利。原先处于弱勢的群体或阶层,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要求改革分配制度,确保自身利益能够得到更公平的体现。这就会加剧社会矛盾。

从总体上看,这些矛盾是有可能在现有的体制中通过激烈博弈,进而促使变革来加以解决的,但其过程可能是小麻烦不断。而经济的发展,尤其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仍然会对这一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。恰如泰国《商业报道》杂志的分析所言:最可能出现的导致经济突然降速的原因,正是东南亚摆脱贫穷的增长模式。这一过于依赖出口和廉价劳动力的模式可以让东南亚国家走出贫困,却未必能走向发达。

可以说,东南亚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体制的改革和调整,使分配体系更为公平;如何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升,使经济的发展更有持续性。

(据《人民日报》)



泰国南部那拉提瓦府朴亚西亚村穆斯林小学快乐的孩子们。